

论基督教对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影响

毛丽娅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系,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 西欧中世纪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文化衰落的时期, 甚至“黑暗”的时期, 并且把造成这种“黑暗”和“文化倒退”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基督教会。事实上, 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公元5—11世纪), 教会的活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西欧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基督教是古典文化的主要继承者, 它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复兴, 奠定了中世纪西欧教育的基础, 促进了西欧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 基督教; 中世纪早期; 西欧文化

[中图分类号] B9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0)02—0085—06

一 基督教继承了古典文化遗产

恩格斯指出, 中世纪欧洲“从没落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失掉文明的城市”[1](400页)。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保存了作为一种崇拜秩序、一种思维结构和一种生活原则的基督教文化的丰富传统”[2](38页)。诚然, 西欧中世纪前期的文化低潮多少与基督教会“对异教文化”的排挤和蔑视有关, 但必须指出的是, 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呈现低潮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奴隶制总危机的涤荡冲击、万恶的奴隶制度所造成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结果。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所产生的反抗和战争不仅摧毁了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 而且使得经营了几百年的文化艺术也在战火中焚毁殆尽。另一方面, 罗马帝国自进入3世纪以后, 它在文化上的发展状况已趋于衰落。再说, 根据吉本的估计, 在君士坦丁改教前夕, 整个帝国的基督教徒不超过

居民总人口的20% [3](63页)。虽然这个数目尚无法得到确证, 但它至少说明基督教对于罗马统治集团产生重大影响是较晚的事情(不早于公元3世纪)。如果离开了以上这些原因, 同时又无视当时“蛮族”的实际文化水平很低的情况, 他们“没有书面文献记载, 没有城市, 没有石器建筑”[2](19页), 而只是根据昔日雕刻精美的偶像被一概销毁, 一些修道士在原来写有科学文化知识的羊皮卷上换写上宗教内容等行为, 就认为基督教会是造成中世纪“黑暗”的原因, 难免有点本末倒置。实际上, 基督教在当时成了古典文化的主要继承者。

基督教从古典文化中得益最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在构建基督教理论体系的过程中, 历代的神学大师们为了使教义更富有理论性, 更具有说服力, 他们把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的学说搬到“圣经”的侧旁。第一个把希腊哲学引

[收稿日期] 1999—11—25

[作者简介] 毛丽娅(1965—), 女, 四川乐山人,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人宗教教义的关键性人物是斐洛(公元前 30 年—公元 45 年),他把斯多噶派的“宇宙精神”和柏拉图的“巨匠”等同于犹太人的“上帝”,把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说成是上帝的本质属性,上帝凭借它进行创造,并改变人类的命运。在斐洛看来,当“逻各斯”被人格化时,便成了上帝的化身,或上帝的长子,如摩西等圣人都是具有肉体的逻各斯。这样一来,斐洛便迈出了基督教哲理化的第一步。早期基督教教父查士丁在向皇帝安敦尼·庇乌和皇子马可·奥勒略进呈的“护教书”中力图证明:基督教教义就是罗马人所喜爱的希腊哲学,耶稣就是苏格拉底的“理性”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的人格化,柏拉图惩恶赏善的概念实际上与基督教善恶报应的教义是同一回事,基督徒与希腊哲学家同信一位上帝,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罢了[4](251—256 页)。另一名教父奥利金也认为,古典学术与基督教信仰是一致的[5](113 页)。

基督教不仅利用和改造了古典哲学,它还从古典文化的其他方面以及东方神话中广泛地吸取养料。基督教《新约》中的许多故事,如圣灵降孕于童贞女生下了基督,基督所行各种神迹,基督以死给人类带来新生以及基督死后复活等等,据认为实际上是东方和希腊罗马古代神话的翻版。甚至连基督教的宗教节日(如圣诞节、受难、复活和礼拜等)都不是基督教的创新,而是对于地中海地区古老习俗的承袭。难怪恩格斯指出,基督教是“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噶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的”[6](251 页)。

古希腊、罗马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结合和融合始于斐洛,而其集大成者则是奥古斯丁(354—430 年)。在《上帝城》一书中,奥古斯丁系统地阐释了基督教关于创世、善恶、原罪、堕落、预定、拣选、恩典、拯救等主题,叙述了基督教救赎的历史过程及其哲理,奠定了教会至上权威和教会之外别无拯救等神学教义的理论基础。

正是基督教为了构建其理论体系而引入古典学术,使古典学术并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湮灭,而是在基督教神学的束缚下,以一种特殊

的方式保存了下来。美国学者桑戴克就认为“基督教引起古代文化之衰败者少,而填充古代文化衰败所产生之空隙者多”[7](19 页)。

二 基督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复兴

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的复兴,与罗马教会的传教活动、修道院制度在西欧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中世纪早期的寺院,既是一种宗教团体、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和经济实体,又是贯穿于其中的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在法兰克王权和基督教会的共同支持下,本尼狄克派寺院迅速兴起和发展^①。它首先盛行于意大利,在 7 世纪后推广到了高卢,到 8 世纪已遍布整个法兰克王国,到 9 世纪末,仅高卢地区就先后建立了数百所本尼狄克派寺院,成为西欧一股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从教会方面来说,这一浪潮的兴起,还受到了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影响和推动,他先后派遣不少高级教士分赴西欧各地具体领导建立寺院的工作。

“正是在修道院里,拉丁文化的传统与基督教生活的模式才被保存了下来”[2](39 页)。在这方面,早在 6 世纪,加西道拉斯(496—575 年)就使这些古老的学问传统在修道院里找到了庇护所。毕达哥拉斯派在数学研究上的一些论著以及希波克拉提斯、尤多克索斯、欧几里德、门内马斯、阿基米德、厄拉托塞、阿波罗尼斯、海伦和丢番图等人的著作都是在这些修道院的高墙内得以保存下来的。不少寺院保存着罗马时代伽图、瓦鲁科琉麦拉和帕雷狄阿斯等人的农业著作,后来寺院本身也编写了一些农业指导和农业方法的书籍[8](182 页)。这对于当时欧洲地区农业技术的保存和生产力的恢复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著名文化史家克里斯托弗·道森指出:“基督教会承袭了罗马帝国的传统。……罗马帝国政治制度的崩溃留下了一个任何蛮族国王或酋长也不能弥补的巨大空隙,而这个空隙被作为新兴民族的导师和法律制订者的教会填补了。”[2](18 页)。

西欧中世纪早期文化首先在不列颠爱尔兰的修道院取得了繁荣,接着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英

^① 6 世纪初,意大利安布里亚城的贵族本尼狄克在罗马附近的蒙特·卡西诺山上建立了一座寺院,并为这座寺院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即著名的《本尼狄克教规》,这是本尼狄克派寺院正式建立的标志。在我国,这派寺院通常被译作本笃会。

格兰,诺萨布里亚(Northumbria)在7世纪末一度成为学术中心。本尼狄克·比斯科波(628—690年)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宗教艺术和学术的发展。他曾多次前往罗马和高卢旅行,并将大批的泥瓦匠、玻璃工匠以及歌唱家带回英格兰,用以装饰教堂和进行礼拜活动;同时,他还带回了大量的手稿、油画、圣徒遗物和法衣。公元678年,他还从罗马带回了圣彼得大教堂唱诗班的大领唱,这位罗马巴西勒修道院的院长,花费了两三年的时间“指导诺萨布里亚的修道僧学习罗马赞美诗的音乐和罗马宗教仪式每年的安排”[2](59页)。

在西欧大陆,文化复兴找到了查理大帝这位保护人[2](64页)。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查理大帝出于政治目的,在他执政期间(768—814年),曾微服出访,四处罗致学者,“他在其宫廷里聚集了从意大利、西班牙到英格兰和爱尔兰等西欧各地的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物”[2](64页)。想从兴办学校入手来振兴帝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公元774年还请来了语法学家比萨的彼得,随后,盛请英国教士——诺萨布里亚文化的代表人物阿尔琴(730—804年),召集教会各类人才赴法兰克办校讲学,还聘请到历史学家——《伦巴德人史》一书的作者——保罗·狄亚科奴斯以及西奥多尔夫、爱因哈德等人。此后,其孙秃头查理又请来拉特兰努、埃里金纳等知名学者。这些学者创办法兰克宫廷学院,收徒授课,翻译整理古希腊、罗马文献,从事哲学、文学研究,并努力促进王朝宫殿及教堂建筑、绘画、雕刻等艺术的发展,很快就兴起了中世纪学术研究的风气,形成了中世纪哲学与文化更新的趋势,史称“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9](50—51页)。

在查理大帝的赞助和奖掖下,欧洲文化艺术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期间建成的亚琛王宫教堂以其独特的中殿、侧廊、交叉甬道、圣坛、后殿及中心的圆形塔楼而构成“西部设计”特色,在欧洲建筑史上具有革新意义。那些附属于这些建筑的众多绘画与雕刻作品也纷纷亮相。教堂内的大理石柱、青铜门、雕花穹顶与各种宗教壁画、彩色镶嵌相映成趣,富丽堂皇,揉进了罗马、拜占庭以及叙利亚等艺术风格,给人们以全新的感觉。查理大帝利用教士把被墨洛温王朝君主们所舍弃的

古代知识文化传统重新连接起来。教会收集、抄写古代希腊、罗马作品,有几个修道院和教堂还设立了手抄本图书馆,“全赖九世纪以来所抄的稿本,几乎所有拉丁作家的著作才能保存到现在”[10](67页)。尽管查理大帝时代的文化水平仍然很低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毋庸置疑,“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标志着古代地中海文化已通过基督教成功地移植到了西欧大陆,并为日后新的复兴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道森评价说,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成就,“是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是为有意识的整体的西方文化的起点”[2](66页)。

欧洲中世纪早期的文学也主要是基督教文学。7世纪时,北英格兰诗人西德蒙曾编出诗歌《创世记》,这部作品被认为与一千年之后弥尔顿的《失乐园》有着同样的想象力和思想性。8世纪盎格鲁—撒克逊著名诗人辛纽伍尔夫的作品《朱莉安娜》、《埃琳》和《基督》也反映了这类宗教主题。此外,6世纪基督教哲学家鲍埃蒂在囹圄中采用诗歌与散文交错对比的形式写成的名著《哲学的慰藉》,也被视为欧洲文化史上哲学、伦理、美学和文学的“黄金宝典”,其优美的文笔、丰富的想象和深刻的寓意感人肺腑,堪称千古绝唱。不仅如此,欧洲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在流传中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在中世纪基督教影响、甚至同化欧洲各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这些民族的许多历史歌谣、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也因与基督教形式的结合而得以保存和流传,如8世纪英格兰英雄史诗《贝奥武甫》将其氏族社会的命运观与基督教的上帝观相混同,11世纪法国英雄史诗《罗兰之歌》对其民族英雄和基督教信仰的颂扬[11](365页)。与此同时,“新型的基督教诗歌利用了传统的英雄史诗的想象力”[2](49页),如《十字架之梦》、《安德烈》等诗歌。

在数学方面,通过传教士们的传授,水平也有所提高。从生活在公元8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数学家阿尔昆(约公元735—804年)所编写的一本数学学习题集上的内容,就可以看到这种进步状况。以后,在修道院内所开设的“七学科”中,除了文法、修辞、辩论术和乐理外,还包括算术、几何和天文等学科,这些学科的设置对于修道士来说,其目的自然同宗教有关,但是,对于数学这一学科来

说,至少起到了传宗接代的作用,尽管这种传宗接代的范围仅限于修道院之中,但是,它却为以后数学的“复兴”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可见,在古典文明衰落到 12 世纪欧洲各大学的兴起这一长达 700 多年的促进时期内,修道院在西欧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修道僧是西方的使徒和中世纪文化的奠基者”[2](39 页)。在阿尔琴、拉巴努·莫鲁、爱因哈德以后,文化复兴运动由加洛林王朝的大修道院继续推行着,每座修道院都保持了由查理曼宫廷学校和阿尔琴后来在图尔的学校所建立起来的传统,并且在帝国分裂以后,正是这些大修道院,特别是德国南部的那些修道院,如圣高尔修道院、雷切诺修道院以及泰杰西修道院,承袭了全部的传统[2](66 页)。随后诺曼底和英格兰修道院又再次成为西方文化的领导力量[2](67 页)。

三 基督教奠定了中世纪西欧教育的基础

在中世纪,基督教继续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1](400 页)。僧侣是当时唯一受过教育的阶级。教会不仅收集、翻译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作品,编写史籍,起到了承先启后、传播文化的重要作用。教会还直接创办了学校。教会学校包括修道院学校和在大教堂兴办的大教堂学校,构成了当时学校教育发展的主线。

无论是修道院学校,还是大教堂学校,所开设的课程基本上在“七艺”范围之内。“七艺”是古希腊、罗马的传统课程,到 6 世纪左右,西欧卡西奥多隐修院的修士们已将古代罗马学校设立的课程文法、修辞和逻辑这“三艺”与算术、几何、音乐、天文这“四艺”合并为“七种自由艺术”,并加以保存和应用,使之成为中世纪世俗和宗教教育的基础。加洛林王朝的宫廷和修道院学校即用拉丁文来讲授这“七艺”,其文法为拉丁文法。修辞是为了传授阐释教义和讲经布道的辩才,逻辑是为了提供从事神学论证和反驳异端学说的形式推理方法,二者成为后来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滥觞。算术是用来解释《圣经》中数字的神秘意义;几何则是根据《圣经》的叙述来描绘大地形状;音乐的内容是礼拜圣诗,其曲词均用于宗教仪式中的赞美诗吟唱;

天文学是用来推算教会的宗教节日,按教会传统来构设宇宙模式。不过,正是这种教会教育,为欧洲大学的诞生提供了温床,而且“七艺”课程在后来的发展完善中也逐步形成为欧洲学校的独特课程体系[9](51 页)。

教会学校培养的对象不仅仅是修士和教士,也有世俗人家的子弟[12](116 页)。他们保存了罗马帝国晚期正在衰退的拉丁文化传统。尽管这些教会学校的研究与教学,无疑以基督教信仰为前提,但也培养了一些人才,中世纪早期一些著名的文化人物都出自教会,如法兰克都尔地方主教格利哥里青年时代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写了十卷本《法兰克人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爱因哈德 19 岁进入修道院,学习成绩优异,才智过人,刚过 20 岁就被推荐到查理大帝宫廷任职,著有《查理大帝传》。拉巴努·莫鲁编有教科书《论神职的教育》(De Institutione Cleri Corum)、《无序字典》(Liber Glossarum)和《有序注解》(Glossa Ordinaria)。不仅如此,教会学校成为了日后中世纪欧洲大学的来源之一,并为中世纪中期兴起的大学提供了一大批著名的教师。

四 基督教促进了西欧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中世纪初期,日耳曼封建王国的建立和发展,是在拉丁文化和日耳曼文化互相融合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在当时,拉丁文化与原始纯朴、粗野尚武的日耳曼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日耳曼人横扫西罗马帝国大地的过程中,大部分罗马知识分子或者随帝国官僚机构一起被诛灭,或因惧怕蛮族征服者而隐匿乡村,而当时掌权的日耳曼统治者文化素质十分低下,有的国王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需要签字时,只会划个“十”字,“甚至查理大帝宫廷中的显贵极大多数都是文盲”[13](53 页)。这样,那些熟悉罗马语言、拉丁文化和地方法律,并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基督教会僧侣,便成为当时唯一有知识的阶层,成了“古代拉丁文化——语言、文学、科学和艺术的主要继承者”。当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基督教西派教会为了自身的生存,不仅承认“蛮族”所建立的国家,而且向那些地方派遣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以便重振西派教会。496 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正统基督教,在 549 年召开的奥尔良宗教会议上将其正式

定为国教。大约在公元5世纪中叶,基督教传到了不列颠诸岛,6世纪末大不列颠基督教化,以后南部英格兰王国也接受了基督教。勃艮第王国也在奥尔良宗教会议以后皈依了基督教。到公元6世纪中叶,高卢全境的居民在名义上都成了基督教徒。587年,罗马教会宗主教格列高利设法使西哥特王接受了罗马教会的神学思想(当时主要是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成为罗马基督教的实际拥护者”[14](55页)。格列高利经过努力,使伦巴德人皈依了罗马教会,他重新控制了拉文那、伊利里亚、亚尔勒等地的教会事务。罗马教会的传教活动,也得到了王权的支持。圣卜尼法斯(约680—754年)承认“没有查理·马特的支持,他的传教工作将是不可能的”[2](80页)。

随着基督教在这些“蛮族”王国中的传播,那些尚处于氏族社会形态的“蛮族”,一方面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继承并发展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在基督教中获得了拉丁文化的各项成果,其中包括语言、文学、科学、哲学、建筑、艺术、音乐、绘画、教会的组织制度等内容。“一种新型的基督教文化,通过修道院传教士和修道院学校的活动而被植入到未开化的土地上”[2](57页)。

这些“蛮族”在“他们天然的老师”[12](238页)“较高层次文明的使者”[2](18页)——基督教传教士的教化下,迅速臻于“成熟”。这些“蛮族”,不仅逐渐放弃了“流动迁徙”思想,而且从基督教传教士们带来的基督教的组织形式中学习到了“社团”、“定居”和“国家”等观念,农业生产已成了这些蛮族新居民的主要生产形式。从表面上看来,尽管其文化发展水平不如古代文化,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却已是一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当我们把视野拓展到整个欧洲,而并非仅仅停留在罗马帝国故土的时候,便不难发现:西欧乃至整个欧洲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尽管出于宗教目的,但他们的传教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可以说西派教会在西欧乃至北欧地区的传教的过程,也是普及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过程。因此,基督教西派教会的传教士们到蛮族地区去传教就是送去了“黑暗”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此外,基督教西派教会积极从事对蛮族的传

教活动客观上还促进了民族融合,并使政治分散的西欧以基督教为纽带联结成为一体。

随着蛮族王国纷纷皈依基督教,西欧国家的基督教化,不仅减少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敌对情绪,而且促进了民族间的彼此融合,表现为生活习俗和道德观念的相互渗透,以及两个民族人民之间的通婚,还有语言的融合。当时拉丁语是传教的官方语言,无可讳言,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法兰克人开始使用高卢式的拉丁语(以后演变为法语);在意大利,拉丁语在伦巴德人和哥特人的影响下,形成了各种意大利方言;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拉丁语正在融合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透过这种“融合”,不难看出,这一地区的文化,在民族的相互交融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教会在传教、讲道的活动中,还把《圣经》译为各国文字,采用方言说教,从而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来往和文化交流。

正是基督教在“蛮族”王国中的传播和基督教传教士们的教化使众多落后的日耳曼部落由氏族社会直接踏上了中世纪的文明轨道,这些原始图腾的崇拜者在短短的一二个世纪内便成了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们在与罗马人的长期接触中最终被迫与后者融合,推动了西欧历史的向前发展。不仅如此,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一系列措施,对于罗马教会的独立与发展,“对冲破迄今为止教廷生存于其中的狭小范围起到了积极作用”[14](51页),罗马教会成为西欧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支力量。然而,更重要的是,从这时起,西欧通过一个共同的信仰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治组织真空的教会组织而连成一体。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格列高利一世是“欧洲之父”,是“西方文化之父”。因为事实是当西方的不同民族被融合进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团体中时,他们才获得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一点把西方的发展与其他的世界文明区别开来了”[2](18—19页)。

总之,在西欧中世纪早期,教会的活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西欧文化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对其继承和传播古典文化方面所起过的承上启下的客观作用,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正是通过教会把基督教和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因素传播给那

些“蛮族”，“西欧才获得了统一与形式”[2](19页)。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作为中世纪初期西欧的主体文化，它对日后西方文化发展走向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即便是文艺复兴的纯属自然主义方面的成就也取决于它的作为基督徒的先辈们。

……文艺复兴的伟人们，都是精神境界高尚的人，即便他们深深地沉浸在世俗秩序里。从他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经历所聚积起来的资源中，他们获得了占领物质世界并建立一个新的精神文化所需要的能量”[15](96页)[2](6—7页)。

参考文献

- [1]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 [3]吴于廑·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4]罗伯逊·基督教的起源[M].北京:三联书店,1958.
- [5]W.O.丹皮尔·科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 [6]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7]L.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上[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
- [8]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9]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文化面面观[M].济南:齐鲁书社,1991.
- [10]瑟诺博斯·法国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 [11]卓新平·世界宗教与宗教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 [12]G.F.穆尔·基督教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13]谢缅诺夫·中世纪史[M].北京:三联书店,1956.
- [14]Walter Ullmann·中世纪教皇统治简史[M].伦敦,1974.
- [15]基督教与新时代[M].1931.

On Christianity's Influence Upon European Culture in the Early-Stage Middle Ages

Mao Li-ya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History Department, Sichuan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Middle Ages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 period of cultural decline, or even of cultural darkness, and the decline or darkness is completely attributed to Christian churches. In fact, the churches' activities in the early-stage Middle Ages contribute a great de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West European culture under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Christianity, the main inheritor of classic culture, contributes to the cultural revival, lays a foundation for West European education, and contributes to cultural exchange among the West European nations in the early-stage Middle Ages.

Key words: Christianity; the early-stage Middle Ages; West European culture

[责任编辑:凌兴珍]